

李雪涛 温 馨 编

莱茵 访学——中国学人的德国记忆

ZWISCHEN RHEIN
UND ELBE

Leben und Studium
Chinesischer Studierender
in Deutschland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莱茵 访学

中国学人的德国记忆

ZWISCHEN RHEIN
UND ELBE

Leben und Studium
Chinesischer Studierender
in Deutschland

李雪涛 温馨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莱茵访学：中国学人的德国记忆 / 李雪涛，温馨编．—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9

ISBN 978 - 7 - 5097 - 7378 - 9

I. ①莱… II. ①李… ②温…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6165 号

莱茵访学：中国学人的德国记忆

编 者 / 李雪涛 温 馨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玉敏 李延玲

责任编辑 / 高 靖 梁 帆 沈 艺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际出版分社(010)59367243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7.875 字 数：168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378 - 9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一个基金会、一位汉学家和一群中国留德学生

李雪涛

本书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不同年代的学者在德国学习、生活的经历，这些人都与一个基金会以及一位汉学家的名字紧密联系：天主教学术交流基金会（KAAD）和汉克杰（Heinrich Geiger）博士。本书包括了几代留德学人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其中有李长山、陈泽环、康志杰等 50 后，翟灿、张德峰、杨九华、徐龙飞、李雪涛、顾卫民、曾金寿、夏可君、宗晓兰等 60 后，以及 70 后的张旭，还有罗莹、陆遥、张欣、罗颖男、陈笑天等 80 后。本书反映了留德学人从不同时代、不同视角看到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德国的发展，以及德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些留学德国的学生所学的专业涉及哲学、音乐、美术、艺术史、宗教史、历史学、社会学乃至物理学等人文、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回国之后，他们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对德国的仰慕及想象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通过 KAAD 奖学金的资助，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到了德国，到了欧洲。

在出国之前，大部分中国学生，对德国学术有着一种仰慕之情。作为 70 后学人的张旭就写道：

以前曾读过季羨林先生的《留德十年》，从书中也可以看出季羨林先生一生的学术基础和成就基本上都是在留德十年做出的，回来之后就再也谈不上学术上的更进一步了。（本书第 163 页，以下仅注明页码——引者注）

这当然是跟德国拥有悠久的人文传统和扎实的学术方法分不开的。

1994 年初踏上德国土地的朱刚甚至认为：

我今生第一次把脚踩在了德国的土地上。那一刻，我相信这是“另一个世界”，告诫自己一切都是新的，都将从头开始。我甚至欺骗自己，欧洲的天不是蓝的，是五彩的。但当踏踏实实地站住了，我深深地呼吸了一口，发现一切都不是想象的那样，天依然是蓝色的。（第 91 页）

今天看来，当时真的太激动了。不过 20 世纪 90 年代我第一次在法兰克福机场降落、看到到处是红瓦白墙的尖顶房子时，也感觉来到了格林兄弟的童话世界。

二、不同时代从国内办手续到德国的经历

去德国之前需要在国内办理相关手续。从曾金寿的文章中，可以重温 20 世纪 90 年代初办理出国手续之艰辛，他提到的“涉外亲属证明”“支付培养费”等，我也都有印象。出国是一

件大事，相关手续办理起来实属不易。这些或许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讲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当时却难倒了很多当事人。以前在德国读书的时候，读到法国作家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的一句话：“Die Erinnerungen verschönern das Leben, aber das Vergessen allein macht es erträglich”（回忆美化了生活，而只有忘却能使得生活可以承受），当时深有感触。实际上，今天再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笑了之的回忆，已经很难想象当时的情形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办理出国手续之难还常常让人一筹莫展。

在两德统一前就去德国留学的陈泽环，于1989年10月起当时东柏林的洪堡大学进修。在德国期间，他正好经历了柏林墙倒塌的时刻：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1990年10月3日深夜，我来到勃兰登堡门——柏林的象征附近，观察德国人是以何种方式庆祝自己国家重新统一的。那天深夜虽然十分寒冷，但受到德国人庆祝国家统一欢乐情形的感染，我也感到热乎起来。（第16页）

李长山记录了与汉克杰博士一家在波恩的友谊。20世纪90年代初，他和家人住在波恩的哥德斯堡（Godesberg），我在波恩大学读书期间也在那里住过五年之久，因此，他的描述让我读来倍感亲切。文中他也讲述了女儿雨欣在德国快乐成长的故事。

此外，李长山是为数不多的当时能在德国大学讲授汉语的

代课教师，从1989年起，他就在波恩大学的东方语言学院讲授汉语语音。俗话说，“教学相长”，此话一点不假。李长山跟他在波恩大学的学生也建立起了友谊，因此，他说“我累并快乐着”（第7页）。

曾金寿对当时蒂宾根大学音乐学院授课的情况予以了说明。

除访学和研究工作外，顾卫民还分享了他儿子在海德堡幼儿园的美好经历。顾卫民将这些经验总结为五个方面：感情和友谊；遵守纪律和诚实；儿童很少看电视，注意听力培养；注重实践，教育来源于生活；老师的负责与爱心（第146~148页）。

作为基督教历史学家，康志杰借助于KAAD的奖学金在德国著名的汉学机构——华裔学志研究所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她讲述了她在波恩的语言学校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奖学金获得者一起学习、生活的经历。她的生日到来之时，来自西班牙、印度、印度尼西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同学们分别用不同的民族语言来向她祝福。因此，她写道：“在语言班学习期间，与其说是学习德语，不如说是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第154~155页）康志杰描述了她在圣奥古斯丁（Sankt Augustin）参加圣马丁节的经历（第155~157页），这也让我回忆起在波恩留学的日子。每年11月，天气开始变得阴沉、湿冷，此时我就开始盼望当月11日傍晚的灯笼节游行队伍，因为傍晚孩子们手里的灯笼会给人以明亮、温暖的感觉。据说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一位罗马军人马丁曾割袍与乞丐

分享的事迹，在他去世后而设立的。这是一个北莱茵地区的节日，之后就是斋戒日，宣告着来年科隆狂欢节的到来。

罗莹是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到德国南部的小镇埃尔朗根的，她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对德国人的第一印象，“不苟言笑、恪守规矩，一语概之：没人情味”（第 179 页）。而她在与德国导师郎必榭（Michael Lackner）教授的接触中，流露出了对德国学者的钦佩之情：“他总能从资料中一个小小的细节引申出一系列的议题，一并平等无私地与我分享他的智慧与感悟……”（第 182 页）

这期间到德国的还有陆遥。她也是此时沃尔芬比尔特（Wolfenbüttel）的。她描写了从北京这两千万人口的都市到达这样一个德国“小镇”的感受：“德国的许多中世纪小镇都保留有年代久远的木屋，尤其是中心地带街市上的那些小屋，往往一栋栋连在一起，每一栋的门脸都装饰有不同颜色的边框或底色，十足的童话场景。”（第 188 页）“北京的街道和房间里总有人声，总有喧嚣，而这座小镇仿若空灵的世外桃源。”（第 189 页）

罗颖男到柏林之后，住在天主教学生宿舍，作为在中国内地长大的 80 后，他觉得那里的一切都很新鲜：“就餐前，大家会齐唱圣歌，做祷告，饭后会围坐在一起进行主题讨论或做游戏，……主要为了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第 194 页）柏林的地铁，没有北京烦琐的安检，熙熙攘攘的人群，连上下车都需要自己按按钮：“我学着他人的样子按动车厢门上的按钮……”（第 195 页）这些对很多第一次到德国的中国人来讲

都是全新的体验。罗颖男也对外交部政治档案馆和柏林自由大学做了精彩的描述。

张旭到蒂宾根大学图书馆之后，感慨万千：“面对这么理想的研究条件，剩下可做的就是一件事了：拼命读，拼命写，充分利用它。”（第165页）。

目前，由KAAD资助、正在科隆大学读博士的陈笑天，则有完全不同的经验。他与汉克杰是通过导师徐龙飞教授在北京大学认识的，之后顺利抵达德国，进行博士阶段的学业。

三、留学德国的意义

就我个人的留学经验来讲，除所学专业外，在欧洲接受德国教育以及文化熏陶的经历本身，对于我的人生道路和精神发展都产生关键的影响。作为德国哲学重要的研究者和译者的陈泽环认为：

20多年来，我为中国引进德国文化尽了绵薄之力。究其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我有到德国访学的经历，其中特别重要的是1995年由KAAD资助的访学，这使我有机会比较系统和全面地了解现代德国哲学——伦理学的发展成果。（第13页）

因此，在德国留学、访学的机会，对大部分中国学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

在异国和祖国之间，在与异质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这些留德学人始终扮演着双重角色。他们由对德国学术的学习、翻

译、研究，到对中国传统和当代文化的研究，孜孜不倦地做着自己的贡献。陈泽环便是其中一位。他从最初对天主教伦理学、施韦泽等的研究，转向中国伦理学研究，从而完成了从他者文化研究到自我文化研究与认同的转变。

对于作为基督教艺术史学家的顾卫民来讲，21 世纪在海德堡访学的收获不仅在于开阔视野方面，他还总结了在学术研究上向德国学习的四个方面。一是研究学问要从源头做起。他举例说德国做中国佛教艺术研究的学者，不会将眼光局限在中国境内的研究对象上。他们对于犍陀罗、印度、东南亚的佛教艺术均有深入的了解。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对佛教艺术传到中国以后发生的流变加以分析，才能比较出其中的异同。二是多种学科知识的运用。他举例说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教授曾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向他们实地介绍一座古老的圣彼得教堂，这令他佩服不已。三是注意细节的剖析。他举例说，德国艺术史学者的著作特别注重人物的详细剖析，除了人物的家族和生平之外，还会专门讨论其宗教感情及其形成的原因、癖好和心结、与同时代的各种人物的关系等。四是理性主义的客观批判精神。他认为，德国学者所写的教会史著作，对教会人物的评价基本上没有受到其宗教的影响。（第 143 ~ 145 页）

对于很多学人来讲，德国的留学生涯成为他们人生的转折点。张德峰写道：“‘在德国留学是我人生中最重要转折点之一’，我得到 KAAD 奖学金的支持，并由此真正开始了我的艺术之旅。这不仅圆了我的留学梦，也使我的人生步伐变得沉

着坚定，艺术生涯丰富多彩，问题意识渐入深刻。”（第 59 页）。

而张旭写道：“留德一年不仅是我从事基督教神学思想研究最有收获的一段时间，也是令我终生难忘的一次文化之旅。”（第 170 页）

翟灿在德国停留的时候，重温孩提时代的游戏，让她重新感受到了生活的多样性：

组织者特别重视全体参与，总是让同学们贡献集体游戏，穿插表演。这可年年把中国学生难住。这帮人基本上从小都是爱学习的好孩子，除了幼儿园时代玩过丢手绢、击鼓传花外，早忘了什么是集体游戏。（第 83 页）

在德国留学的日子，也使得这些学人真正地走出了所谓的书斋。他们参加各种研讨会，跟不同的人接触，参观各类文化设施（宗教的、世俗的），等等。这有助于他们全面了解德国的社会、文化、历史，同时也有助于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

尽管改革开放初期去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在国内接受的是无神论的革命教育，但是在德国基督教文化氛围中，他们还是从吟唱一首黄河船夫曲中，体验到了信仰的神圣性：

……他们推举我临时代表大家，吟唱一首有点精神性内容的歌。我选了一首黄河船夫谣，用循环往复的调子，慢慢地唱着黄土地上一群跋涉的心灵：“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上——，几十几条

船咪——”我们后来非常高兴，其他国家的同学们居然都听懂了歌中的辛苦、寻觅，大家还十分喜欢这个曲调。祈祷结束的时候，不但韩国同学纷纷跑来夸赞我们的“祈祷歌”真好听，而且音乐细胞特别发达的非洲同学，居然连基本旋律都学会了，小礼拜堂和庭院里，有好一阵子都有一些浑厚男声，回声一样重唱：“几十几道弯——，几十几……几十几……”（第84~85页）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中国的曲子在脱离了原来的情景和脉络后，在全新的语境中往往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新的、具有创造性的诠释和理解。

作为艺术家的张德峰在德国开始思考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他写道：

……我也开始沉思中国当代艺术的核心问题，我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主导力已经非常弱小，原因不仅仅是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更多的还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缺少西方文化中那种救世创新的献身精神。因此，在被彻底破坏的传统废墟上，中国人很难建立起创新的现代文化机制。（第67页）

多年来在中国生活学习的经验与欧洲文化艺术相遇，必然会产生差异、不解和困惑。这样的陌生感反过来会促成对自己文化的反思和批判。

四 KAAD 与汉克杰

正是 KAAD 使得这么多的中国学子有机会到德国去，接受另外一种文化的教育。中国学生到了德国，当他们从一个熟悉的世界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所操持的语言由汉语变为德语时，也承受着不同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冲击与考验。在这种情况下，用熟悉的汉语发出的一声问候，对很多中国留学生来讲可能都是巨大的心理慰藉。

罗颖男对 KAAD 的评价是：“KAAD 所有工作人员正是以这样一种和风细雨般的柔情关心着每一位奖学金生的学习与生活，使得大家仿佛跨越了国家和宗教的藩篱，成为温暖而和谐的一家人。”（第 201 页）

作为一家基金会，KAAD 的具体工作是通过其工作人员得以彰显的，而对中国留学生来讲，汉克杰则是 KAAD 的代言人。张欣写道：“汉克杰博士是一个温和、热心、健谈的人，他有很强的亲和力和儒雅的气质。”（第 210 页）

众多回忆文章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汉克杰博士跟所有这些中国留学生的接触都特别真诚，他常常会在过节的时候将中国留学生请到家里，让这些在异国他乡的游子们感受家庭的温暖。

作为 KAAD 亚洲部的负责人，汉克杰常常跟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奖学金生打交道；他同时也是汉学家、哲学家；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美学和音乐的研究有着很深的造诣；他也是艺术家，他的水彩画让人想到 19 世纪的印象

派……但种种身份对于汉克杰来讲远远不够，在这本集子中，大家将他称作“我们这些来自亚洲的孩子在德国的‘大家长’”（第190页）、“在我们中国留学生心目中也是一位文化使者”（第84页）、“爱的使者”（第64页）等。

1995年夏天，宗晓兰一家在西安第一次见到汉克杰博士，她在回忆的文章中提到了当时见面的情形：

我们第一次见到汉克杰博士，就感到他有些亲切，因为他不像一般想象中的外国人那样高大魁梧，需仰视才行。他大概不到一米八，头发虽不那么乌黑，但直直的倒挺像中国人；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眼睛，不仅炯炯有神，而且非常友善。（第28页）

汉克杰不仅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而且是一位汉学家。夏可君从一个侧面描写了他与汉克杰的接触给自己带来的对中国文化认识的改变：

遇到汉克杰博士，对于我，是一次机会，让我重新发现了中国文化的自然之美，让我有可能再一次以新的目光来看待中国文化的自然审美观。与汉克杰博士的相识，让我认识到，并非一个中国人生来就具有自我认识的优势，并非生长在这个文化中就一定可以本能地认识这个文化的美，这不是想当然的，除非你对自身有着再一次的认知，除非你唤醒生命中潜藏的因素，即自然的内在性。（第120~121页）

很多中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中国。但凡有点阐释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夏可君从作为汉学家特别是美学家的汉克杰身上认识到了这一点。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波恩的时候，翟灿认为汉克杰既是他们这些来自亚洲不同国家年轻人的领导，又是大家的朋友，“他幽默亲切，轻松低调，善于分配角色和沟通，与大家从未刻意保持过距离”。（第 82 页）我认为，这个说法非常准确。汉克杰非常注重亚洲各国年轻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翟灿在回忆中讲述了一次由汉克杰策划的换位思考的活动：

他有一次组织我们亚洲部同学座谈，给各国留学生们出了个题目：换个角度，从他人的角度去看自己的文化。这个话题激发了各国青年们的文化间对话，促使我们审视自己。我就是在那一次，从听到一个印度尼西亚同学对中国的抱怨开始，从不解到了解，到第一次真心反省自己的大国心态：我对自己邻国的文化，对那里的人民，关心了解得实在是太少。（第 82 页）

在德国，中国留学生也学会了如何同亚洲各邻国学生交往。此外，翟灿也指出了汉克杰对她人生的意义所在：“因为他的文化使命感，我才作为研究者与德国哲学和文化结下不解之缘，我在人生路上从他这位文化使者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品质就是爱心和尊重。”（第 89 页）

杨九华曾三次获得 KAAD 的奖学金，有幸在著名的科隆

音乐学院读完了硕士和博士。他的回忆文章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北莱茵地区的音乐图景。他除了感谢 KAAD 之外，也特别感谢汉克杰及其家人：“他们慷慨无私地为德国的音乐文化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也在巧妙的缘分中成就了我一生中最为美好的异国求学经历。”（第 101 页）

通过跟汉克杰的多方接触，朱刚认为：

日积月累，挂在他脸上的是抹不去的责任、善良、厚重、严谨。他有着德国人特有的眼神：坚定、透明！逻辑、风趣、从容、包容是汉克杰做人的标准。他从不摆主人姿态，为人谦和，尊重各种肤色的人。（第 92 页）

汉克杰的这些特点，也体现在其他人对他的描写之中。

沈奇岚对汉克杰从银行到基金会工作的选择赞赏有加：

汉克杰先生来到基金会之前，在一家著名的银行工作。高薪，稳定，职业轨迹清晰且闪亮。可是日日对着数字，让他觉得这不是他的人生。于是先生就辞了职，来到这个并不十分起眼的基金会工作。……在基金会工作，需要无限的精力和耐心去服务。汉克杰先生的工作，是在亚洲各国选择有志于学术的青年人，为他们提供深造的机会。（第 172 页）

这样的人生选择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显得尤其可贵。沈奇岚接下来写道：“物质于他，并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音乐、美、人和人的相遇、对道德的追寻、对人的成就、对美德的实

践，才是他值得追求终身的生命真谛。”（第 178 页）并且认为汉克杰“有着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达观的处世态度”（第 119 页）。Bonum virum natura, non ordo facit。（Publilius Synus）这句拉丁文格言的意思是，一个人之所以好，并非来自其地位，而是源自其人格。我觉得这句话所说的就是汉克杰这样的人。

正因为如此，大家都抱着感恩的心情来撰写这些文章。陈泽环写道：

我崇敬的德国文化伟人施韦泽始终强调“感恩”的重要性，确实应该如此。虽然，与二三十年前相比，自己现在各方面的处境好多了，但不能忘记，在刚刚走出封闭且尚未完全告别贫困的时候，我曾经受到以汉克杰博士为代表的德国人民的帮助，这是应该永远铭记在心的。（第 14 页）

到德国之后，在 KAAD 的聚会上，罗莹才接触到这么多亚洲国家的人：“若非身处德国，我们很难与如此之多来自亚洲邻国的年轻人齐聚一堂，也难能如此直接地聆听来自邻国的声音乃至批评，实际上只有身处第三国，我们才能拥有一个抽离各自现实处境及牵绊，冷静思考、对话回应并试图理解彼此的宽松氛围。”（第 183 ~ 184 页）

在从柏林到慕尼黑五个小时的车程中，罗颖男看到的是与在北京的地铁上看到的截然不同的场面：“我仔细观察到，德国人不论男女老少，几乎没有人是在火车上睡觉，全都专注地看着手中的书本，柏林的地铁里也是一样；与之相比，北京的地